

# 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sup>\*</sup>

金以林

**内容提要** 阎锡山从 1911 年到 1949 年,前后统治山西近 40 年。这在民国时期地方实力派中是绝无仅有的。1930 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曾被迫下野,一时仿佛销声匿迹,难以再起。但不到一年,他又公然返回山西,重新控制原有地盘,再次在国内政坛上扮演纵横捭阖的角色。宁粤和谈期间,阎锡山一面积极参与逼蒋下野,同时又将矛头对准因“九·一八”事变而内外交困的张学良,秘密联合北方韩复榘和粤方汪精卫等积极倒张。阎锡山的这些活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利用这一机会,恢复了原有势力。

**关键词** 阎锡山 宁粤对峙 蒋介石 张学良

学术界对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活动大多很少涉及。笔者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前期成果(批准号 05CZS014)。

宁粤对峙始自 1931 年广州“非常会议”的成立,双方的公开对峙结束于 1932 年 1 月蒋汪合作,最终结束于 1936 年的两广事件。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指前一阶段。有关宁粤对峙时期阎锡山的研究,除文史资料收有部分口述回忆外,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相关资料最为集中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在现有阎锡山生平研究中,涉及这一段史实时,因缺乏原始档案,大都以口述史料为主要依据。其中代表性成果有中共中央党校“本书编写组”编《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利用台湾保存的阎锡山档案,力图揭示这一段历史,并以阎锡山的再度复出这一个案,进一步回答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相互妥协和权力重组的内在因素。

## 一、阎锡山返晋风波

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最终因张学良引兵入关,支持蒋介石,导致阎锡山、冯玉祥等的反蒋战争以失败告终。这对阎、冯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两人被迫宣告下野,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但细细看来,两人的处境却有很大不同:首先,阎锡山有着一块精心经营近20年的根据地——晋、绥两省;而冯玉祥在他曾控制的陕、甘、豫等省却没有很深的根基,无法赖以生存。其次,晋军在中原大战中一直注重保存实力,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大多较完整地撤回山西;而冯玉祥部在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激烈战斗中,受到很大损伤。三是阎锡山在晋军中仍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凝聚力,各将领间尚能保持大体团结,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阎投蒋行动;而西北军内部却早已出现离心离德的倾向,战败后更是四处逃散,七零八落。除韩复榘、马鸿逵等早在中原大战前降蒋外,石友三、孙殿英、吉鸿昌、孙连仲等部也在大战后期纷纷叛冯投蒋。

蒋介石虽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还没有足够力量同时消化掉晋军和西北军。中原大战结束后不久,因为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再度引发国民党内的分裂,形成宁粤对峙,更使蒋无力北顾,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残存势力不得不区别对待。同时,对于在大战中给予自己重大帮助的张学良,也不能不有所酬答,而将黄河以北全部划入张学良的势力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收拾战后北方局面的策略,首先是彻底解决冯玉祥部,对西北军用一个“拆”字。大战刚一结束,蒋即电令

何应钦：“对西北军，如其各个来接洽者，请切实进行收容。若整个来接洽者，拒绝之。”此后，除早已降蒋并在中原大战中立有战功的韩复榘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拥有一省地盘外，其余西北军被拆得四分五裂。石友三部奉命驻防河北顺德，宋哲元部暂驻晋南绛县，吉鸿昌部驻豫南信阳，孙殿英部驻山西晋城。蒋随后又将暂驻山东，原本和韩复榘属同一阵营的孙连仲部调往江西。从此，作为一个完整军事系统的西北军，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对付阎锡山，蒋介石则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出通缉令，迫阎脱离部队，而将晋系军队交予张学良整编为 4 个军，分别以阎锡山旧部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以赵承绶、周玳为骑兵和炮兵司令。晋系部队又能合法地在自己老家成建制地完成整编。这正是阎锡山日后得以重返政坛的本钱。

宁粤对峙发生后，粤方积极联络北方反蒋势力，派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希望藉此扩大反蒋同盟。这又为刚刚失败的阎锡山提供了新的机会。

1931 年 7 月 20 日，原西北军石友三部首先在北方树起反蒋旗帜。阎锡山积极参与其事。晋系将领中，商震并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被蒋介石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引起许多忠于阎锡山的晋系将领的不满，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为此，商震决定脱离晋系，向蒋请求率部出晋，助蒋抗击石友三。当时，在晋系将领中徐永昌的威望最高，蒋介石将商震部调离山西后，只得任命徐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以免引起山西将领

---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0 年 9 月 3 日)，《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文物图书。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 159 页。

邹鲁：《回顾录》下，台北，三民书局 1976 年版，第 327 页。

内部疑惧。

正在这时,阎锡山于8月5日由大连秘密返回山西。

尽管此时阎锡山仍受政府通缉,商震又投蒋离晋,但他此行决非贸然之举。阎锡山历来精于算计。他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他仍获得晋系将领的支持,即使是新代省府主席徐永昌,“对主座(指蒋介石)固甚感激,但彼绝不背阎”。因此,阎锡山返晋不会有任何危险。二是阎锡山得到粤方的支持。就在阎氏返晋当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及所部诸将领,恳请二人继续领导北方反蒋武装“即起图之”。甚至连同他长期面和心不和的冯玉祥也不得不承认:“事已至此,势非百川(阎锡山)先生出而主持,决无其他良法。”同时,阎锡山的行动还得到日本军人的暗中支持。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夜,日本侵略者正利用一切可能有用的力量来破坏中国的统一。正是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之一的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阎锡山乘日军飞机秘密返回山西。

阎锡山返晋立即引起蒋介石、张学良的紧张。他们二人都深感此事异常棘手。据孔祥熙提供的情报显示:“五台系与石(友三)

---

有关阎锡山支持部下参与石友三反蒋的详情,见金以林《从反叛到瓦解——石友三1931年反蒋失败的个案考察》,(台北)《近代中国》第156期,2004年3月。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元二电》(1931年7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以下简称阎档),微缩胶卷,72/0970。

《天津执行部致阎锡山冯玉祥徐永昌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傅作义电》(1931年8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全宗档,三 383。

《冯玉祥致王(法勤)覃(振)柏(文蔚)邹(鲁)等电》(1931年8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全宗档,三 382。

《阎锡山日记》(1931年8月5日),阎档,18/0221—0222;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初版,第1651页。

签字,占领平津,晋即出兵。某知友言阎借日款三千万元,广东助四百万,阎贴三百万,意在大局。”以上情报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在阎的背后又多了一层日本人的关系,这就更令蒋、张深感不安。

此时,蒋介石的处境已不同于中原大战胜利之时,他的主要注意力正集中在同他公开对抗的粤系和“剿共”两方面,对北方,着重对付已被拆散的西北军,而将黄河以北地区作为酬劳交给张学良处置。除对韩复榘无力调动、石友三公开反叛外,蒋介石拟将宋哲元、吉鸿昌南调“剿共”,以减轻来自粤方的压力(原驻山东的孙连仲部已调入江西剿共)。阎锡山返晋一下打乱了他的原有计划。

此刻张学良的处境也颇困窘,虽然他很想将阎锡山驱逐出境,但仅靠东北军入关部队尚不足以对付山西。而自万宝山事件后,日本军人就一直企图在东北诱发军事行动。“初拟利用张宗昌,而宗昌无力,旋乃以飞机载阎锡山返晋……如果东北军与阎、冯军队不免一战,则日本将乘共产党蜂起之际,使列强无容喙之余地。”

阎锡山返晋后,除商震外,“山西将领均往谒”。同时,阎还亲自致电商震表示:“请以团体为重”,“望商回并(太原)”。当得知商不为所动后,原同商震最接近的绥远省主席李培基即在“大同被赵承绶扣留,华北情况殊未可料也”。

8月9日,蒋介石在研究山西问题时,曾自记道:

《太原蒋守一致南京孔祥熙虞电》(1931年8月7日),阎档,80/0770—1。

《日本外务省记录》,转引自梁敬鐸《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95年第5版,第62页。

《天津王懋功致广州昭佳电》(1931年8月9日),阎档,48/1816—7。

《最近山西局面》,天津《国闻周报》第8卷第32期,1931年8月1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页。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佳电》(1931年8月9日),阎档,80/0794。

山西方面自阎锡山回来以后必将谋叛,余应决定办法:一积极进攻;二消极则不发饷。但第一项积极办法必先征求张学良与韩复榘之意见后再决可也。至吉鸿昌部,如不解决则北方之后顾终堪虑也。

蒋介石此时确实处于两难境地,既没有力量对晋“积极进攻”,又不可能“消极不发饷”,那样做无异公开将晋方置于对抗地位。为此,他只能继续采取分化手段,拟将西北军宋哲元和晋系商震调离华北,拆散阎、冯势力可能的联合。8月初,蒋分别致电东北军秘书长王树翰指示:“启予(商震)既离晋出征……则乘此属其率领所部南来,先入岳州,以便随时策应。”再电宋部总参议萧振瀛:“明轩(宋哲元)兄部如愿调离晋南,则可否调来江西填已克复之地区,俾此间得以抽出部队对粤也。”但张学良从自身利益考虑,更想将宋、商二部调至河北,这样一旦同晋军发生冲突,东北军不至于首当其冲。蒋对此甚为不满,电张表示:“如宋部仍驻河北,则与晋南无异,不如不调。请速决调赣。”

8月10日,蒋介石派往北平协调对晋关系的航空署长葛敬恩实地调查晋系情况后,不主张逼阎离晋。他电蒋报告华北军情,并向蒋建议道:

商震现仅其嫡系步兵四团,当不致为晋人诱归,亦不够剿匪实力,惟其自己不肯南开,而副部(张学良)亦欲利用其恨晋

---

《事略稿本》,1931年8月9日,蒋档。

《蒋中正电王树翰等商震离晋出征应派徐永昌代理并与张学良切商》(1931年8月3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08。

《蒋中正电询萧振瀛如宋哲元愿调离晋南可否调赣填防俾抽出部队对粤》(1931年8月11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25;阎档,80/0825。

《蒋中正电张学良速决是否调宋哲元部至赣》(1931年8月11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27。

之心理留之石庄,以对付晋人。次辰(徐永昌)代主席已发表,惟尚无表示,大约数日内必有回音。观其就否,即可以判阎此后之态度也。至硬逼阎离晋,此时恐难做到。观各方对阎之归,虽未有种种观察,以职判断阎氏之归,即令纯为作乱而来,以晋军动员慢之故,亦在三星期后。而晋省地形彼既易于防守,我亦易于堵塞。窃以为目下大局,对北应以东北之刀,防晋外窜,以经扶(刘峙)之众镇摄(慑)豫、鲁,而在剿赤许可之范围内,尽管抽调精兵约五六师趁粤寇移动,即一举加以痛击,乘胜入广州,取消其伪政府。是时,如北方仍然安靖,则彻底平定桂、粤,如北方事变已起,则留相当之兵力制止桂军,于粤境之各军回师北指,晋、鲁无粤府煽惑资助,或可不动。若妄动,亦不难一鼓荡平也。

同一天,孔祥熙也电蒋报告晋阎与奉张的关系,并建议:

阎乘日机返晋,冯(玉祥)有赴五台之说,似与粤方有联络。闻东北老派亦曾有代表在(大)连接洽。渠(阎)之不助石(友三)因双方目的俱在平津,利益冲突,故特坐视。现在突然回晋,因晋军内部意志纷纭,非渠回晋无法统一……弟意以为晋军将领拉拢甚为容易,如此次商启予之出兵讨石……晋省现在反商甚剧,弟意立应商之汉卿(张学良)以徐(永昌)代商(震),并将诸将请求随时酌予容纳,必生效力。

8月16日,蒋在日记中慨叹道:

阎锡山回晋后,北方变故在酝酿中,而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鸿昌必叛,两广日图进犯湘赣,湖南之何键态度又不明。

《北平葛敬恩致南京蒋介石蒸电》(1931年8月10日),阎档,80/0806—7。

《上海孔祥熙致蒋中正蒸电》(1931年8月10日),阎档,80/0804。

此五者应深切研究而熟虑之。

在这种多方告急的处境下,稳定北方对蒋介石至关重要。因此,对张学良的意见,他不能不表示尊重。此后,蒋不再提调离宋、商之事,而着重考虑如何安抚晋系将领和处置西北军吉鸿昌部。19日,蒋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之处置问题;其次则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以商为豫冀晋边区督办、杨为绥晋边区督办、孙为山西清乡司令如何?”

此时,驻防河南信阳的吉鸿昌与粤方联络频繁,随时可能反蒋。如吉部异动,自信阳出鸡公山可直捣武汉,同两广军队夹击两湖,形势相当危急。蒋一度拟“用武力解决吉”部,不曾想到“事机泄露太早,反生差误”,引起吉部两师长的怀疑。幸亏何成濬及时发现,才未导致该部“挺[铤]而走险”。这一切更迫使蒋希望迅速安定北方。8月25日,蒋再次电张学良指示:“北方局势务须求一根本安定办法,勿使其受两广出兵之牵动。除使阎、冯离境出洋外,并将商震、杨爱源、孙楚三人从速委其名义为要。”蒋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封官许愿,拆散对方内部团结,以达逼走阎、冯的目的。

对于驱走阎、冯一事,张学良的态度是同蒋一致的。张学良特电新上任的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表示:“现在国家力求巩固和平统一,先生(指阎锡山)应即速行放洋考察,以正各方视听。”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6日,《省克记》卷4,蒋档;《困勉记》卷18,原稿抄有该段日记,后用毛笔删除。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9日,《困勉记》卷19,蒋档。

《何成濬致南京蒋中正号酉电》(1931年8月20日),阎档,80/0939。

《蒋中正电王树翰北方局势务求根本安定办法及使阎冯出洋》(1931年8月25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48。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篇初稿》第4卷,第1652—1653页。



据徐永昌日记载：“山西之危运，可谓至极，某某日言阎回后之山西决不可靠。”而此时“晋将领多主张留阎在晋，徐永昌如不能为之做到，本身即有问题，故徐日来极感痛苦”。徐曾私下向孔祥熙驻太原代表蒋守一表示：“愿将权位给杨星如（杨爱源），伊当从旁协助。至对阎，关系已告一段落，如阎仍有活动野心，伊不能受命，今后只有拥护中央，完成和局云云。惟对阎、赵（戴文）自由问题似仍关念。对商乱调军队，深表不满。”徐自己事后也曾回忆说：

八月十六日，中央派葛敬恩航空署长来察看阎回山西后发生些什么情形，因葛与我是陆大同同学，关系亦好，他信任我的话，觉得阎先生不会有危害国家的行动，电报蒋先生说阎不走亦可，但因蒋先生曾与张汉卿有约，黄河以北归张主持，故张要阎走，蒋亦不肯留阎。

葛敬恩自山西返回北平后确实曾向蒋表示：“弟意中央对阎若必逼令出国，倘彼走粤，是反助其势，益增纠纷。不如以新由粤分化者目之，以示宽大，务使有利中央。否则结怨树敌，循环报复，非计之得。”徐永昌甚至私下致函阎氏表示忠心：“如外方非逼先生走不可……则我直谓先生之归，是我发起，我承认起来。万一没办法时，我与先生同走。”

有趣的是，此时西北军旧部对驱冯玉祥出洋一事非常坚持，而

---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463页。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艳电》（1931年8月29日），阎档，80/1022。

《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麻电》（1931年8月6日），阎档，80/0756。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225页。

《北平葛敬恩致上海张群宥电》（1931年8月26日），阎档，80/0991。

《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第463—464页。

晋系将领则一致反对驱阎锡山。尽管张学良认为：“阎、冯不去，华北即大受影响。仍催促甚急，即不出国，亦应在国内指定地点居住，不能留晋。”但晋系将领一方面向张学良表示“晋军决不能因阎断送国家”，以求张学良安心，另一方面仍坚持“阎留晋无甚关系”。此时受蒋之命来北平协助张学良安定华北的中央要员之间也意见不一。李石曾、葛敬恩认为阎留晋对时局影响不大，而吴铁城、张继则坚持阎非出洋不可。此问题一时成为僵局。

此刻，蒋介石正煎熬于“吉鸿昌部未得解决，而一切计画殊难实行，故忧虑倍至”之中。他被迫对吉部妥协，暂时放弃武装解决的计划。8月28日，蒋下令调吉鸿昌为军事参议院参议，以冯玉祥旧部而已归顺的李鸣钟接掌吉部。此后，蒋又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即将出兵湖南讨蒋的粤方，无法顾及阎锡山。29日，蒋再电张学良、韩复榘讨论处理阎锡山问题时，口气明显软了许多，全权交与张、韩处理，只是强调：

阎事须有一根本处理办法，务须公私兼顾，而于国家纪纲尤须注意。彼为国家通缉之人，而乃自由回晋安居，则国家与政府体面何存？……且阎乘人之飞机回晋，显受倭寇煽惑，否则至少亦有勾结外人、破坏国家之嫌。于公于私，殊难谅解。请杨（爱源）、徐（永昌）、傅（作义）诸同志在平期间，必求一解决之道。如其能保持国家体面，愿仍出国，则政府亦可与其相当体面，以留余地也。何如请与向方兄（韩复榘）等详商。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艳电》（1931年8月29日），阎档，80/1022。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浚电》（1931年8月30日），阎档，80/1032。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6日，《困勉记》卷19，蒋档。

《事略稿本》，1931年8月28日，蒋档。

《蒋中正电张学良韩复榘详商阎锡山事根本处理办法》（1931年8月29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71。

9月1日,张学良同晋军将领最后商讨的结果是:“第一步由张派大员随徐、杨返晋劝阎、冯早行或来平津居住;第二步由各将领以电婉劝;第三步则停止给养,所有晋省杂牌军队不予调出。”

就在这一天,广州“非常会议”正式下达武装讨蒋令,两广军队开始出兵湖南。

## 二、反蒋派系内部的矛盾

尽管阎锡山返晋引起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极度不安,但北方反蒋派系之间仍是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同时,晋阎内部也因中原大战失败而暴露出许多新的矛盾,一时难于统一。阎返晋前,山西将领间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先是商震离晋前“由省行提取现洋数拾万,致社会秩序金融益形惶恐”。徐永昌受命代理省主席后,又同杨爱源“暗争甚烈”。但南京方面对情况也做了过分的估计。孔祥熙驻晋代表蒋守一曾将晋系内部矛盾向孔报告道:

谨将晋将领之派别及各人主见分别呈报,仰乞参考:傅宜生(作义)、李生达是准奉派,希望主察甚力;荣甲三、李慕颜为中央派,因实力过小,难免被人挤下去。生迭电请助荣部,即此故也。杨星如、王治安(靖国)、赵印甫(承绶)、张会诏、周玳为阎之嫡派,惟杨、王二人欲离阎自主,野心不小。其余皆为己做,非为阎也。再余如龙泉、光甫、毅如、云青等皆可西可东,毫无主见。生此来查得孙、王二人于吃紧时急烈主张联石打奉,惟对中央尚无恶感。石逆解决后,中央对晋当有善后计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东电》(1931年9月1日),阎档,80/1050。

《蒋守一致孔祥熙歌电》(1931年8月5日),阎档,80/0736。

《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麻电》(1931年8月6日),阎档,80/0756。

划,否则祸根伏下,早晚准是麻烦。徐返并后,星如平日权衡,完全让渡,心中很不痛快。总之,晋将领完全不能合作。

阎锡山回晋时,原本积极准备反蒋。石友三公开反蒋后,阎锡山曾寄以很大希望,日本特务更不断以假情报迷惑他,向他表示:“石已占保定,河南数部响应,鲁(指山东韩复榘)决援石,蒋对湘鄂赣匪亦无办法,平津为之震动,君再不归,恐错过时机。”但当阎锡山抵晋之时,正值石友三失败之际,反蒋局势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有利。阎锡山“下机后即以上述三条询赵承绶,谓石已缴械,阎颇不悦”。因此,他返晋后不得不暂时“改变态度,主张晋绥将领暂应团结,不为人分化。以徐主晋政,杨爱源主军,即为团结表现。”蒋守一称傅作义为“准奉派”确是事实,在阎返晋前,傅曾对南京“表示绝对服从,愿率所部讨逆”,又有张学良撑腰,阎一时拿他无奈。王靖国、赵承绶是阎的嫡系,阎对他们不能不有所安慰。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因同商震关系密切被扣后,阎即有“易王靖国或赵承绶”之意。阎锡山还组织“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任命杨爱源、孙楚为正、副主任,原晋系军、师长均为委员,希望先借此安定晋系内部,把它看作首先要务,再根据局势发展伺机而动。

此时,粤方一直在积极推动阎锡山公开反蒋。为了加强北方反蒋派系之间的团结,广州方面派邹鲁到天津组织“非常会议”北方执行部,以“胡宗铎代桂,王东臣(懋功)代汪,邓哲熙代冯,赵不

《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鱼电》(1931年8月6日),阎档,80/0748。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文电》(1931年8月12日),阎档,80/0841。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真电》(1931年8月11日),阎档,80/0818。

《苗培成呈蒋主席五月有电》(1931年5月25日),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真电》(1931年8月11日),阎档,80/0818。

周珪、赵承绶等口述:《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72页。

廉代阎为委员,全权处理”。但各派系间仍彼此猜忌,难以团结一致。蒋方虽有情报称“阎确领粤款二百万,日人允借千万”,事实上邹鲁北上之初,仅携款100万元,以40万元助冯玉祥,30万元给石友三,20万元付孙殿英,余10万元为平津活动之用。因经费完全由邹鲁控制,故“胡宗铎、王栋臣以邹不能代表广东大生意见”。8月中旬,广东国府还致电天津执行部:“以冯、孙均未助石,令扣款不发”,而“胡、王、邓、赵等因分赃不均,暗潮甚烈”。阎返晋后又“欲军政由其一手包办,邹来颇感不快”。对此,王懋功曾有一电致汪精卫,对北方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反蒋前途不可过于乐观的情形分析得颇为精彩:

阎回河边村,山西将领均往谒。判断其可能性有三:甲、联蒋;乙、友蒋;丙、团结内部,乘机观变。然证之徐次辰与李石曾之勾结,马福祥代表近日与阎来往之情形,绝对反蒋恐不可能。韩虽表示希望阎团结内部,彼仍团结华北旧部,结果如何,当视环境决定。现时尚难乐观。

海滨(邹鲁)到后,时以国府全权向外宣传,意欲借国府招牌压倒一切,以彼个人为北方重心,而代先生(指汪精卫)在北方之地位,并欲自任国府驻津主任,于其下设军事、政治分会,作改革华北政局之梦。故执行部同人无论何派,除谢持外,对之均不满。我辈只有抓住执行部与彼对抗,冀使北方政局隐然以先生为主,而本身不与发生冲突,以免使先生为难。老阎自海滨到后态度陡变,大约亦以海滨狂妄自大,惹起彼如此作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微电》(1931年8月5日),阎档,72/1090。

《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删电》(1931年8月15日),阎档,80/0879。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马电》(1931年7月21日),阎档,72/1005。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谏电》(1931年8月16日),阎档,72/1124。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微电》(1931年8月5日),阎档,72/1090。

法,不特惹起北人反感,恐中央威信亦将因此损失无存。

党务在长江、珠江均已失败,北方本有可为,但改组派虽有反对,而因津执行部辖区登记人员已由中央派定,西山派本无下层,故亦不利于登记选举,似有与胡张勾结之嫌,结果在北方恐将失败。如何补救?请速图之。

从这个电报中可以看出,北方各派势力首先还是以各自的利益为出发点,很少有顾全大局者。特别是阎锡山遇事狐疑,从不肯轻易冒险,以免损失实力。

阎锡山返晋后,尽管继续联络各方,还一度同四川实力派刘存厚共谋反蒋,但双方在行动上仍相互观望。刘存厚希望阎锡山率先出兵,以便自己染指西北;而阎锡山则想借刘存厚举兵,牵制南京对晋方的压力,以求坐收渔人之利。阎、刘下面这组电报颇能反映出他们当时各自的心态:

(8月16日,刘电阎)望公取和张(学良)图蒋(介石)主义,以主力监视张,并以一部牵制杨虎城,以便敝部北展较妥。

(8月18日阎复刘电)现在蒋方剿共失利,损失甚巨,请即不失时机,迅速北展。此间当遵囑照办。

(8月29日刘电阎)吴蓬莱(即吴佩孚)已赴甘洮合川、甘军图杨虎城,百帅(指阎)趁此和奉图蒋,迟恐两粤不支,则难为力也。存厚俟得百帅、焕帅(指冯玉祥)朝夕之期即行北展,以相响应。

---

《天津王懋功致广州昭佳电》(1931年8月9日),阎档,48/1816—7。

《绥定刘存厚致河边阎总座铣电》(1931年8月16日),阎档,60/1538。

《河边阎总座致天津速转刘积之兄巧电》(1931年8月18日),阎档,60/1538。

《天津转刘存厚致河边阎总座艳电》(1931年8月29日),阎档,60/1542。

(9月3日阎复刘电)蒋方剿共失力,两广大军已动员入湘。兄处如能出兵三万,西北唾手可得。此间已准备妥当,静待大军进展出动情形。

(9月7日,天津转刘复阎电)粤桂出动自是良机,但据报该军尚未实进展。刘积之(存厚)部图杨虎城决无犹移,只待阎总座决定协动,届期即当北进。

反蒋各派几乎都抱着如此心态,希望别人先动手反蒋,以求缓解自己所受的压力,待时局有利于己方时再行动。这自然难以成事。但南京方面也深知:“粤如急速出兵,则阎自不长久沉寂。”蒋介石对晋阎仍不敢掉以轻心。

### 三、“九·一八”事变后坚持反蒋倒张而拒绝日人利用

就在南北密议联合倒蒋的同时,北方军人中一直酝酿着要推倒张学良在华北的统治。

早在1930年9月18日(刚好是“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正是因为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率东北军入关,才最终导致阎、冯失败。从此,华北纳入张学良的势力范围。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正式建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设官邸于北平顺承王府,东北军的政治中枢也由沈阳迁至北平。

张学良对华北的控制,自然引起当地原有势力的不满。1931年7月下旬,石友三首先反叛。虽然打出的旗号是反蒋,但实际针

《河边阎总座致绥定刘积之兄江电》(1931年9月3日),阎档,60/1542。

《天津转来刘积之致河边阎总座阳电》(1931年9月7日),阎档,60/1544。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江电》(1931年9月3日),阎档,80/1075

《张对新闻记者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16期,1931年4月2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对的目标则是张学良。石的部下唐邦植在战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不称为反蒋战争,而称之为“石友三倒张之战”。石友三起事前虽接受粤方的正式委任和财政资助,但“石向北进,违粤节制,粤极愤恨”。可见,在当时很多北方军人的心理中,倒张重于反蒋。

此时,日本侵略者对反抗中央的各派势力,都在背后进行分化拉拢,以期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广州“非常会议”派邹鲁等到天津建立北方执行部,行动常受张学良的打压。据覃振、胡宗铎等电报粤方称:“在津同人数日以来备受压迫,其所以能安全居住者”,主要原因就是“受日人保护”。同样,中原大战失败后避居大连的阎锡山也是由于获得日人暗中支持,才得以继续遥控山西省政。早在石友三叛乱之初,蒋介石即获知:“晋军背后仍受阎主持,闻大连太原间可直接通电,无线电台均设置日人家内。”据孔祥熙派往天津的代表丁春膏7月13日报告:

顷晤商震代表李镜容,谓近日谣言甚大,万一石部有变,不仅孙(殿英)军有虞,即晋军亦必一致行动。春膏诘以背景尚有何人?李答晋军之指使者当然仍是百川。春膏复问外间有言阎氏在连颇受日人逼迫,倘不急进,便不再任保护,是否属实?李答亦闻确有是说。

9月18日,也就是阎锡山回晋后一个多月,日本悍然出兵占领东北三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各政治

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江电》(1931年9月3日),阎档,80/1075。

《天津覃振胡宗铎等致广州汪兆铭支电》(1931年8月4日),阎档,48/1812。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敬电》(1931年7月24日),阎档,72/1026。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元二电》(1931年7月13日),阎档,72/0970。



派系谁也不敢再一意孤行。宁粤对峙双方被迫停止武装冲突,在上海举行和谈。但粤方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同时,张学良的声望因受“九·一八”事变的打击、东三省的沦陷而摇摇欲坠。这在阎锡山看来,又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此时,阎锡山不仅要取消政府对他的通缉令,而且跃跃欲试,准备利用蒋介石和张学良内外交困之机,推倒张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取而代之,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国难当前,他又不得不考虑以下两点:一是不可轻易以武力倒张,否则难得国人的同情;二是不可过于和日本勾结,而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方针和对策。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东北的同时,更加紧对各派势力的分化拉拢,借此浑水摸鱼,达到进一步分裂中国的目的。“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阎锡山派驻“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的代表贾景德一日内连致数电给阎锡山,主旨都在倒张,背后都有日人的暗中操纵。其中有二电表示:

顷某(指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参谋长竹内来谈……彼方虽如此做法,并非对中国国家有何种恶意,亦非图占地方,其意只在倒小张,极盼我方乘此时机驱奉军出关,彼必不敢抵抗。如果郭壁(指粤方)与我方对彼方在彼此有条件的谅解之下,对我方亦可为物质上之援助,并为军事上间接之帮忙等语。此事如能处置得宜,似于国权、地方两无所损,否则危险甚大。彼所谈各节只向野(贾景德)及(邹)海滨、(刘)维炽说之,他人均不知道。愚意外交交涉应如何办,现可让郭壁任之。

我若乘此驱奉军出关必失中外之同情,若能利用此机使

---

《天津贾秘书长静密皓电》(1931年9月19日),阎档,21/0215-8。

东北另换长官,亦北方大局之幸。

一向精打细算的阎锡山自然不会轻举妄动。他终究要比贾景德老练得多,在国内外局势尚未明了、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之时,阎是不会轻易采取行动的。同时,面对日本的侵略,阎锡山还能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复电提醒贾氏:“此事关系甚大,容俟考虑考虑再说。不过日人最喜造谣,希注意之。”同时,阎致电徐永昌称:“东北事件存亡所关,请转告张副司令,无论如何处置,余必一致服从,并应劝晋将领共赴国难。”据南京方面得到的情报显示:“张接电后即嘱徐回并主持。徐日内可行。冯部将领已表示精诚御侮。传冯、阎与日一致,实不可靠。”

此时,南京政府也深知再坚持逼迫阎锡山离晋并不现实。为了预防阎氏有可能同日本的勾结,9月20日,孔祥熙首先以个人名义致电徐永昌表示:“关于百公应否离晋,弟个人原无定见,前之电商石曾先生,盼百公以文字发表意见者,即为其撤消[通]缉令,自由留晋。”此时,为了稳住华北局势,张学良也电请国民党中央赦免阎锡山。9月30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政会,讨论是否赦免阎锡山,会议讨论得相当激烈。

陈果夫:“阎锡山这次回来,是日本人送他回来的,他和日本究竟有什么关系?要他声明一下。”

李石曾:“主席,本席这次由北平回来,对于张副司令请赦免阎锡山事,略为知道一点,所以报告一下。在前多少时,石友三叛变之前,各方传说很多,说山西将参加石友三的行动。”

---

《天津贾秘书长静密皓四电》(1931年9月19日),阎档,21/0207。

《复天津贾秘书长马电》(1931年9月21日),阎档,21/0213。

《北平华觉明致何成濬二电》(1931年9月22日),阎档,80/1260。

《上海孔部长祥熙来号电》(1931年9月20日),阎档,60/1556。

北平方面,总司令有许多电报去,要山西直接或间接帮助消灭石友三。那时阎锡山对徐永昌表示要与中央一致。这次日本侵略辽、吉,阎锡山即打电报给张副司令,表示要全国一致拥护中央共赴国难。张副司令在石友三叛变之前,就有电报请撤销阎氏通缉令。现在全国一致对外,山西将领一致拥护中央,所以张副司令再请撤销令,并开复党籍。本席还要补充说明的,阎氏已表示以后不愿从事政治生涯,要做开发实业工作,已与孔部长文电商量。孔部长也很赞成他做实业。军人下台之后,能专心于实业之开发,不特有利于山西,且与东北边地垦殖有补,又可改变一般军人之心理,所以本案对于撤销通缉一节,本会可以通过,至开复党籍方面,请送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主席(蒋介石):“本席从前曾表示过,对阎锡山不能赦免。但在现在时局上看起来,对于日本暴行,他表示一致对外,似可准其恢复自由,而且各方面都希望中央宽大。他既有电报给张副司令表示一致对日,拥护中央,可否照张副司令的主张?不过前天他发表的电报,只说要共同抵抗日本,没有讲他自己怎样。如照现在要免予通缉,他应该要表明他自己的心迹。”

邵元冲:“他能不能再表明态度?”

李石曾:“中央如免他通缉,他当然可以进一步的表示的。我们知道山西人是很直爽的,如要打电报给他,总有回电的。不过现在电讯往返颇费时日,阎锡山要想做乱是不至于的,他以后一定可以进一步表示的。现在去电时间既长,而北方局面也有关系。他要作乱,石友三叛变时,也就作乱了,日军进侵辽吉时,也就作乱了。从前政府下令通缉,是处之以常,现在免予通缉,是处之以变。请照张副司令的办法。”

主席：“依李先生的意思，撤销通缉？”

叶楚傖：“文字上可否改为‘姑许免予通缉’？”

主席：“那是一样的。开复党籍事，送中央常会。今天准张副司令的请求。”

陈果夫：“他与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李石曾：“究竟有没有关系？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关系的。他心理怎样？这就不能说。不过中央表示宽大，如中央要严厉的办，那末在法令上说，他既在山西，便应下命令着山西文武各机关通缉归案究办。如真的这样做，山西时局不免于变动，此无异帮助日本人。所以在改变军人心理上及时局需要上说，中央应免予通缉。”

主席：“阎锡山看来不至于和日本有何关系，也有一部分凭据可以证明的。现在可照张副司令的请求。”

决议：“无异议。阎锡山准免通缉，恢复党籍。”

就这样，阎锡山顺利地恢复了他在山西合法活动的地位。同时，他又利用张学良丧失国土、处境危险之机，继续加紧密谋倒张。但他在行动之时也不得不要有所顾忌。他要保证所有倒张行动，都要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求得国人的谅解和支持。20日，贾景德致电阎锡山汇报北方执行部今后行动计划时电称：

现所急须筹计者（一）不使蒋介石利用机会固位；（二）副张根据已失，总座可以着手或说话，时机不要迟回审慎；（三）东北另易长官外交必容易办；（四）可设法使副张内部崩溃；（五）于学忠处来人可否先令其回平密商办法。总之，外侮之

来实以蒋氏招之,先除蒋氏再图对外。

阎锡山立即复电指示:“一、二、三、四均可;五我恐系假冒。如非假冒亦可照办。”于学忠原是吴佩孚部属,北伐后投入东北军,深得张学良信任。22日,贾再致阎电报告:“昨晚学忠派人来征询意见,仅答以前赴晋的人尚未返,但断定必系圆满答复……愚意学忠如能领头欢迎钧座出来了此事,的确尚有做法。”第二天阎即回电表示赞同:“子平(指于学忠)如肯领头发电亦未不可。”而当广州“非常会议”决议:“请阎、冯两委员负领导各武装同志电张劝蒋下野”时,一贯注重实际的阎锡山立即复电否决了粤方的提议,他借故推托:“此时发电请蒋下野,二、三集团及殿英等部项势必中止发给。我原意在未发动以前绝不轻着痕迹。容俟与各将领详细商酌之。”

此时,阎锡山还继续同四川刘存厚及吴佩孚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9月25日,吴佩孚曾致电阎锡山表示:“除派陈幼孜趋候大教外,坤(吴)拟节后由武都进驻天水,纠合甘、川军图剥(杨虎城),与鼎(阎)联络一致,谋蹇(蒋)。”并征询阎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反蒋态度。阎当即复电称:“图剥极赞同,对日军,鼎意倒蹇同御外侮。”此时,在阎锡山看来抗日和反蒋倒张是一致的,只是他自己不肯轻易动武,以免被国人视为助日的汉奸。但他却在暗中不

---

《天津贾秘书长静密号电》(1931年9月20日),阎档,21/0225。

《复天津贾秘书长马电》(1931年9月20日),阎档,21/0229。

《天津贾秘书长和密码电》(1931年9月22日),阎档,21/0230。

《复天津贾秘书长梗电》(1931年9月23日),阎档,21/0242。

《天津贾秘书长和密沁午电》(1931年9月27日),阎档,21/0264。

《复天津贾秘书长勘电》(1931年9月28日),阎档,21/0268。

《刘积之密有电转吴玉帅皓电》(1931年9月25日),阎档,21/0132。

《密复吴佩孚有皓电》(1931年9月29日),阎档,21/0135。

断鼓励别人公开反蒋。当阎获知刘存厚拟“出兵三万”讨蒋后,立即致电粤方表示:“弟意此数不是以会师中原,夹攻武汉,希速请汪先生促动(刘)文辉为要。”而当贾景德再次报告:“某(指日本)方面来谈:北方如无做法,彼方不惜扩大范围,盼钧座有所表示。”阎复电再次警告他:“我只有意赴绥(倒张),然决不愿与某方稍有勾连,致招国人不容。以后见某方人说话时审慎为要。”

#### 四、晋阎与鲁韩、粤汪的倒张密谋

当时北方实力派中除阎锡山外,力量最强的是控制山东的韩复榘。韩是冯玉祥部属中最早投靠蒋介石的人。石友三反蒋之初,冯玉祥一度“使人挑拨韩复榘部曲”,令“韩极感不快”。此时韩复榘对蒋、冯二人的态度可以说是更亲近蒋介石,而疏远冯玉祥。

“九·一八”事变后,韩复榘发觉蒋介石、张学良地位不保,感到有机可乘,也想乘虚而入,反张而取得对平津和河北的控制权。但他虽有此野心,力量和资望都不够,因此联阎倒张,在韩看来也还是有利可图的。

10月初,当宁粤双方和谈之时,晋、鲁之间即开始积极酝酿联合“倒张”。此时驻防晋南的宋哲元部也不愿再隶属于冯。为了自保,宋亦派人联络晋系,向阎锡山表示效忠:“宋军长以总座之意为意,以服从冯先生如服从总座。”

《阎百川致广州程和甫鱼电》(1931年10月6日),阎档,60/1468。

《天津贾秘书长设密蒸三电》(1931年10月10日),阎档,21/0340。

《复天津贾秘书长真电》(1931年10月11日),阎档,21/0345。

《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马电》(1931年7月21日),阎档,72/1005。

《太原刘<sup>升</sup>静密寒电》(1931年10月14日),阎档,21/1062。

10月9日,贾景德有一电致阎锡山,颇能反映出此时北方军人的心态:“宁粤和议真情若何,此间迄无所知。不审南边人倒什么鬼。然以历史、人情揆度,断无得利于北方。此时北方似应另有一结合组织。望钧座熟筹之。派往伯常(韩复榘)的人已有来信,谓伯常对八字条约极端赞成,现正在商定中。”随后,韩复榘即派代表柴东生同贾景德接洽,表示:“(一)双方合作认为确有必要;(二)汉卿前派万福麟去说,系联蒋的大联合,向方仅虚与委蛇。”柴还向贾询问:“晋将来可出兵多少?”,贾即“答以总在十万以上”。

阎锡山得知韩复榘的基本态度后,立即复电贾景德指示:“青二蒸二均悉。北方事非鲁、晋切实结合,不易解决。伯常(韩复榘)对八字条约既极端赞同,即由彼起草,请诸人作证成立,以为解决北方基础。子志(张学良)兵数虽多,军实已亡。但我方亦不轻用武力解决,冒天下之不韪。外交终有落点,届时子志必难幸存,再用政治手腕妥为解决。”阎电文中所称的“青二蒸二”,分别是指9日、10日两天贾致阎的第二封电报,可惜笔者在“阎锡山档案”中并未查到这两封电报,无法得知“八字条约”的具体内容。但从以上电文中可以断定“八字条约”完全是针对张学良而言。

此时,晋、鲁双方都深知如要“倒张”,必须加强合作。但双方存在的最大的矛盾,是“倒张”的目的虽“一致”,但晋、鲁都想以领袖自居,染指平、津。从贾景德致阎锡山的一封电报中,颇能读出此时各自的苦恼:

与向方接头所最困难者,系彼甚愿当首领而又知其实力、声望不够。彼始终意在平、津而与大计划上确有冲突。第一

《天津贾秘书长设密青二电》(1931年10月9日),阎档,21/0327-0332。

《天津贾秘书长设密蒸二电》(1931年10月10日),阎档,21/0346。

《复天津贾秘书长电》(1931年10月12日),阎档,21/0333-4。

层是否仅一军事领袖可满足其欲？钧座是否可领导政治？第二层平、津问题当如何解决？如彼取平、津，子平固非打不可也。均请筹示。

“子平”即于学忠，此时尚在张学良阵营中，驻防平津。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阎锡山终归要比贾景德老练得多。10月15日，韩复榘派代表刘熙众赴晋谒阎，并表示：

一，从前向方与总座未能完全一致，系因环境关系，请原谅。二，向方知总座对彼甚关心，并知山东事晋方确能尽力援助，向方甚感动。三，现在时局十分紧张，确有鲁、晋联络互保必要。四，声明向方自知实力、声望均不够，决不敢做首领。

阎回答道：

一，过去事余深知向方确有苦衷，请转向方放心；二，余为鲁、晋共存及北方大局关系，所以时时替向方设想；三，鲁、晋共存已成定局，望速分访冯先生及宋、徐、杨等，述明情形，研究互保方式回来决定；四，军事首领，向方应以大局为重，毅然担任，否亦必须由向方另找一人担任。请向方万不要推诿，致误时机。余对军政事不愿再去担任，此种苦衷出自本心，请向方决勿客气。

当事情还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阎锡山很明白如何处理其中的奥妙，绝不能把话说大、说尽，要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而又不使事态失控。有时甚至有意布下一些迷阵，引诱对方首先行动。所以他才会有“余对军政事不愿再去担任”，“请向方决勿客气”等语。而且，阎在自己行动之前也绝不轻易得罪蒋、张。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当粤方得知阎锡山曾有电指责张学良，“斥其放弃边防重

《天津贾秘书长努密文二电》(1931年10月12日)，阎档，21/0365。

《复天津贾秘书长删电》(1931年10月15日)，阎档，21/0373-5。



责”,请求“将全文拍来通电”时,阎锡山当天复电表示:“通电事关系军食,前因明轩未归,故难决定。”事实上是拒绝了粤方要求阎公开表态的请求。在“倒张”没有十足把握之前,他是决不愿作为粤方反蒋筹码而贸然行动的,何况维持现状还可继续享受张学良接济的“军食”。

随着宁粤上海和谈的进行,种种迹象显示蒋介石下野将成为现实。为此,晋阎、鲁韩对倒张一事更为积极。为此,阎锡山10月28日致电粤方表示:“以我之意年来蒋、张相依为命,此次东省事变北方对张甚不满,东省尤甚。北方事张复维持不易,和议若僵,蒋似不能不顾虑及此也。”这是阎锡山首次向粤方暗示自己有意染指平津。

10月29日,蒋介石电邀张学良入京面商东北善后问题。此举一时引起各方的不安和猜疑。当时上海盛传“汉卿目的在取得调人资格,固地位,增声誉”。不过也有情报显示:“蒋恐张无家可归,致与粤政府及冯(玉祥)等合作,促张赴京会面,藉观张之情形。张到京表示合作到底,对内对外均唯命是听。蒋亦允继续协助东北军饷。因是蒋对粤方忽变强硬。”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东方面的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人均主张阎锡山应乘机收复平津。粤方的打算是借阎倒张,打击蒋的势力。而阎也同样需要得到粤方的支持,作为他取张学良而代之

《广州潘宜之先生甲密铣电》(1931年10月16日),阎档,12/1335—1336。

《复广州潘宜之乙密转汪先生西密叶电》(1931年10月16日),阎档,12/1335。

《阎百川致广州程和甫西俭电》(1931年10月28日),阎档,60/1492。

《蒋张协商善后》,《国闻周报》第8卷第44期,1931年11月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上海张至心救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阎档,12/1395—1396。

《太原孙司令昌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阎档,12/1397—8。

的助力。此后,阎锡山主动加强同粤方的联系,特别是同一年前他在“扩大会议”上的合作者汪精卫之间往来频繁。期间,桂系更是从中积极穿针引线。

在此以前,阎锡山同汪精卫之间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故事值得一记:10月16日,桂系驻粤代表潘宜之致电阎锡山,转达汪精卫的不满:阎“对汪公电多不复,纵复亦敷衍。然汪公对我公仍不以此介介。近来音信更稀,至为不解。本日再致我公一电,此可谓最后一电,如再不复,亦不欲多事也。”为此,潘宜之特意提醒阎:“不可不于细微处多加注意也。”阎对潘的提醒深以为然,此后阎、汪间的联系明显增加,彼此电报往来频繁。当阎得知李宗仁送“精卫七万元”时,立即派人赠汪款五万元。事后贾景德报告:

思诚带交精卫之款,精卫谓数月以来正以未能助钧座解除困难抱歉于衷,若再受厚赐,益无以自解,嘱代陈钧座取消此议等语。野(贾景德)亲身送往,精卫尚在谦让,拟留若干,璧还若干。窥其意思系欲将其愧歉之意代达钧座,只要钧座再赐一电坚请收受,彼当不再谦让。

果不其然,四天后贾再电阎时即表示:“前送之款,彼再未谈。当算收受矣。”此后,阎、汪之间联系密切。

11月7日,宁粤上海和谈结束。双方决定分别在南京和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以示国民党的统一。和谈期间,蒋介石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成功地

《广州潘宜之先生甲密铣电》(1931年10月16日),阎档,12/1335—1336。

《天津贾秘书长国密宥电》(1931年10月26日),阎档,21/0893。

《上海贾秘书长现密元电》(1931年11月13日),阎档,21/1009。

《上海贾秘书长致一西子异一密篠电》(1931年11月17日),阎档,60/1837—9。

分化了粤方的团结,初步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国内各政治派系关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

但他们间的矛盾仍是错综复杂。汪精卫在联蒋的同时,努力拉阎锡山为其后援。而在倒张问题上,阎、汪利益又是一致的。在汪看来,虽已同蒋达成合作,但打击了亲蒋的张学良,就是消弱了蒋的有形力量,无形中可增强自己对蒋的发言权。同时,阎也借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希图自固,扩大地盘,藉此削弱竞争对手韩复榘的势力扩张。此后,在倒张问题上,汪精卫极力鼓励阎锡山收复平津。阎的代表赵丕廉向汪表示:“推倒汉卿,阎先生与公意极同,惟利用外患做此事,诚虑有冒天下之大不韪。”同时,赵也向汪表达了阎的另一层顾虑:“叔均(指蒋介石)在大扬(河南)驻有重兵,而伯常亦垂涎侯马(北平)、湘浴(天津),此举应审慎。”阎锡山还得到情报显示:韩复榘拟以自己为领袖组织新直系,并有出兵占领鲁、直的计划,仅将晋、察、绥三省划归为阎的地盘。

针对韩复榘对晋阎的威胁,潘宜之电阎建议:“西北军似应有人统率,瑞伯久居津门,似应请其继续参加讨蒋。宜意请钧座及德公向粤中央推任为国府委员。”瑞伯,即鹿钟麟,原是西北军的第二号人物,德公,即李宗仁。潘的用意是想以鹿钟麟来压制韩复榘。阎当即复电表示同意:“拟先派人征求同意,得允许后,即照兄意办理。”

金以林:《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天津转上海明野支二电》(1931年11月4日),阎档,21/0933—4,0941。

《太原孔芸生致阎总座静密亥电》(1931年11月4日),阎档,60/1887;阎档,21/1163—6。

《广州潘宜之先生本密歌电》(1931年11月5日),阎档,12/1389。

《复广州潘宜之先生本密麻电》(1931年11月6日),阎档,12/1388。

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开幕。19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愿率军北上“保护国权”。蒋氏北上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各方势力的猜疑。“据一般传说,蒋将赴平联张,先对付鲁韩,然后封锁晋军。”20日,汪精卫致电阎锡山表达他对此事的看法:

蒋决赴北平,弟料不出两项原因:(甲)抵抗日本,收得国人同情;(乙)奉张为内外所共弃,不能再维持,又恐奉张去后公及韩、冯乘机收复,故自往接统东北各军,不使地盘丧失。弟意今夏蒋出发剿共时,我等且宣言在此时间决不宣战。今蒋若抗日,更当表示一致对外。惟北方地盘关系重要,平、津尤为咽喉。至低限度应采六(委)员制,共同处理,公不可放弃。

第二天,阎复电汪:“公料两点,弟意以为均有之,惟去张一层,恐其左右尚难甘心。蒋如北上抗日,自当表示一致对外,至北方地盘,平津咽喉,诚如尊论不可放弃。但须合作成功后始易参加也。”此时,阎锡山对逼张下野、收复平津,有了一点明显的变化,就是一定要通过统一政府予以合法名义。否则,国难当头,如果轻举妄动,很难获得国人的同情。

## 五、张学良处境岌岌可危

此时,张学良的处境相当危殆。他受到的压力不仅有全国民众对他在“九·一八”事变中实行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满,纷纷要求罢免张学良,有来自反蒋各派的公开挑战,还有日本侵略者的军事

---

《阳泉张维藩致天津宋哲元养电》(1931年11月22日),阎档,49/0345。

《上海汪精卫先生救密寄电》(1931年11月20日),阎档,12/1419。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共密马电》(1931年11月21日),阎档,12/1418—9。

打击。同时,南京内部更有人为稳定蒋介石的统治,主张弃张保蒋。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位岌岌可危。这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看来,正是倒张的良机。

11月8日、10日,日军暗中勾结中国失意军人,连续在天津制造两次事变,拐走末代皇帝溥仪,并企图引起中日间更大的冲突。后因“计划不密,时间迫切,致归失败”。同时,日方还不断活动,极力怂恿阎锡山公开对抗张学良。阎的代表贾景德对利用日本势力倒张最为积极,建议阎尽快采取行动。以下几则贾致阎的电报,颇能反映出日本的阴谋和晋阎同各方联络的实情:

顷闻汉章(石友三)之便衣队齐(8日)晚已围攻津公安局,此事系土肥原从中主动,安福、旧直系军及北方自治救国会均在内,主要在倒张……有人力主须以钧座为重心,北方才不致纷乱,屡来商询。窃以此事颇难应付。可否在此事扩大以后,钧座藉维持华北为名,提兵出来镇慑,一方则密与日人说明免生误会。如此则赴绥(倒张)之目的既达,而亦不落勾结外人之嫌。

湘浴(天津)蒸(10)日之动已系某(日)方与奉军直接开火,将来必要扩大,华北恐至糜烂。各方均盼我方联合各军先行赴绥(倒张),然后再与某方开谈判,较为妥当。

赴绥(倒张)要着首在分化子志(汉卿)所部。比月以来各方虽多零星接头,子志所部亦确有解体可能。然而迄无成议者,一在无多数金钱,一在没有找著重心。伯常(向方)、季滋(汉章)如果北攻,子平(学忠)等必一死抵抗,可以断言。天民

《上海贾秘书长图密钺电》(1931年11月16日),阎档,21/1036。

《上海煜如国密佳电》(1931年11月9日),阎档,21/0994。

《上海贾秘书长致现东现密元二电》(1931年11月13日),阎档,60/1826。

(吴佩孚)最推重之前内长孙丹林,系野(贾景德)旧识,与天民、子平均系蓬莱人,向有往来,现在上海。彼来系盼望北方团结成功者。欲请钧座与天民、伯常等暗结一救国同盟的极简单密约,只言攻守同盟,然后由天民令子平变更态度,一致赴绥(倒张)。据云天民前者衡州班师倒段,即系与南军订此密约收效者。现在为对外计,结此密约,尤为理直云云。可否照此进行乞速示。再野对孙言,如天民主挂五色旗,则断不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蒋方内部也有人秘密酝酿倒张固蒋。据阎锡山得到的报告称:

张群昨(11月19日)告危苞滨云子志(张学良)恐站不住,不如劝其下台。危答以公等上年共事很深,直接劝告较为有力。张答以我们去年系促令上船者,再令下船,话颇难说。又顾少川的亲信来言如果粤方能允推倒子志而令叔均(蒋介石)仍充主席,彼有法子能向叔均说云云。由此看叔均最近确想推倒子志固己位,而自己又不能径办,欲藉粤方要求为之耳。

晋阎的情报还是相当准确的。11月15日,与张群关系密切的黄郛同张公权讨论东北问题时,亦主张“应设法使张汉卿速解职”。而此时进入兰州的吴佩孚居然捏造假通电,以川、甘、青等省17将领名义电请起用吴佩孚,“反抗中央,倒张拥段”,于学忠也列名其中。张学良虽没有于学忠反叛的证据,但此等谣言一度

《上海贾秘书长致现西现密元三电》(1931年11月13日),阎档,60/1827。

《上海贾秘书长实密号二电》(1931年11月20日),阎档,21/0392—7。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藏,原稿影印件。

《西安杨虎城致汉口何成濬删未电》(1931年12月15日),阎档,49/1006。

引起东北军内部的恐慌。“闻副部对于学忠部似已加注意。奉军各旅长有联名电张请除部下南人四凶、北人四凶,实行清君侧。可见内部已有争怨。”为此,贾景德又一次连电催促阎锡山尽快行动:

子志(张学良)已为全国所共弃,子志不去,津乱不会停止。以现在情况说,更非叔均(蒋介石)同去不可,若再迁延,即党、政府亦在站不住的地位。各方极盼钧座急速举动,勉救大局,维持北方。愚见顶好以对日为名,俟得粤府任命,即部署军队作出动姿势,一面派人与子志交涉,作为助其对外亦可,彼如不愿,即请让开平津,让我军通过,一面暗与某方(日本)接洽。盖某方前曾表示过,如钧座肯出来,即骂他们几句,亦无不可。如此做去,既可慰全国人之望,兼可为将来的地步,不须实力,一纸电报即可了事。叔均已到穷途,我再迟疑,必失事机。望钧座断然行之。前奉钧示拟取沉静态度,野(贾景德)窃以为不可也。

汉卿不走,某国必拿天津、北平。在某国手中收复断不如向汉卿手中收复为易,且将来条件上损失亦较小。

对贾景德的激进作法,阎锡山始终不表赞同。29日,阎复电贾氏提醒道:“规复平津固系应有之事,而北方复杂情形尤应顾及。将来我方如办此事,必系由政府名义及命令办理。余意应俟北方准备就绪,再由政府发表进行为宜。”

同日,贾景德同汪精卫会商北方时局,终于明白了阎锡山的沉

《天津林世则致梁冠英漾电》(1931年11月23日),阎档,49/0348。

《上海贾秘书长作密俭二电》(1931年11月28日),阎档,21/0470—5。

《上海贾秘书长救密艳二电》(1931年11月29日),阎档,21/0476。

《复上海贾秘书长艳电》(1931年11月29日),阎档,21/0478。

着和稳健。贾电阎报告道：“今日与精卫熟商，精卫又顾虑到如果以抗日救国为名，蒋反利用此点将全盘重担推到我们身上，反为不利。研究结果拟将来主和后即主张我方收复平津……精卫又问阎先生有让平津与向方说，当答以前些时有此说，但向方如图平津恐学忠等尚有波折。彼亦深以为然。”

同时，汪精卫还请阎锡山的代表张至心返晋，向阎详细转达他对北方政局的看法。阎明确了汪的想法后，复电称：

一，汉卿过去之责任极重，现在亦无振作之气势，非下野不可。如能自动下野，则尊意组织委员会处理河北政务，弟极赞同。彼如不愿下野，则除避免国人不同情外，当联合北方同志努力为之；二，蒋将来下野与不下野，似应以其真有合作救国之诚与否为断，如无诚意，固非下野不可，尊意用兵必不得国人同情。弟极以为然。

12月14日，赵丕廉、贾景德联名电阎报告同粤方，特别是汪派会商今后图谋北方的计划：

我方此次做法明（赵丕廉）等以为只有盼望统一政府将就成立，钧座得以重握军政权，并规复平津，即各方形成割据亦可听之。扩会旧人如理鸣、沐波、巨川等亦均系此意。群拟在一中全会上先提汉卿停职案。公博则拟俟部长发表后暂不就职，先赴北方一行，意在先将汉卿推倒，使钧座握住实权与精卫内外呼应。钧座可来电表示欢迎。又李石曾极欲拿北方实权，曾与子志谈拟约次辰在平一晤，并闻溥泉此次赴晋系受蒋命维持汉卿地位，先使钧座与彼谅解。此间诸人对石曾拿北

《上海贾秘书长作密艳五电》（1931年11月29日），阎档，21/0485。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力密艳电》（1931年11月29日），阎档，12/1422—3。



方,拟极力反对。

阎锡山对赵丕廉等人的计划深以为然。15日,阎复电赵等表示:“所拟统一政府将就成立后,我方重握军政权并规复平津”,“所见极是”。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粤方的压力下,公开发表下野通电。时局再次发生变化。此后,阎锡山将北方倒张的希望寄托在宁粤双方共同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和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身上。

## 六、蒋介石拉汪保张

宁粤上海和谈达成的主要协议是由双方分别召开四全大会,以示彼此结束武装对峙,共御外侮。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在蒋介石主导下顺利闭幕。而11月18日召开的广州四全大会,因蒋介石的分化引起内讧。12月3日,脱离粤方的汪派代表在上海再召开了另一个四全大会。

尽管蒋介石成功地瓦解了粤方内部的团结,但粤方明确表示如蒋不下野,绝不入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宣布下野。

此时,最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北方局势。就在蒋氏下野当天,李宗仁在上海向贾景德表示:“无论对内对外,非去汉卿不可。”并称:“两广拟合川滇黔藉国防为名,成立一国防委员会,北方亦可照办。”同时,“据倭驻津要人消息,中国人民如能促蒋、张出洋,即

---

《上海煜如芷青灰密寒二电》(1931年12月14日),阎档,21/0605。

《复上海煜如芷青电》(1931年12月15日),阎档,21/0615。

《上海煜如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阎档,21/0660。

可撤兵,依法了结善后。否则决定越俎代庖而攻平、津云。”为此,粤方代表入京前就曾秘密商定将来新政府成立后,第一步就是彻底解除张学良的职务。赵丕廉致电阎锡山报告:

子志(张学良)处现在情况之下,固无再留之理,但其实力应如何处置则系一问题。子异(汪精卫)前曾谈过将来拟由中央直辖,未免书生之论。明(赵丕廉)等拟设法运用,能由政府径令钧座接统固好,否则亦可用分化作法使之归我处。正与沐波(傅汝霖)等商酌进行。子志部下(保定军校)第五期军官甚多,与我方军官多有联络。此时似应令其分头秘密进行。至钧座将来名义以何者为好,此时亦应预筹。至将来接收东三省,明等以为如组织接收委员会,钧座亦可任此主干,以为将来布置华北之入手。

反蒋各派的积极倒张活动,使蒋介石感到张学良垮台将造成的危险。他当然宁愿要一向支持他的张学良,决不愿阎锡山、韩复榘等乘机在华北扩展势力。因此在他下野前积极布置保张。他首先以承认汪派在上海选举的10名中委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汪派放弃倒张活动。汪精卫随之改变了态度。同时,蒋再派李石曾赴北平协助张学良。在蒋下野返乡前一日,他还特意召见东北军秘书长王树翰面授机宜。王树翰当天致电张学良报告称:

顷谒蒋,再陈锦州吃紧,战则以一隅之力而抗一国,中央又无人负责;退则国人又将加以罪名。二者俱极困难。蒋言战则既无好结果,于退一层,则不言。翰再三催诘,蒋言日方若不对人,专对事,余定有办法可以设法了结……并谓此际副司令切须持以镇定。政分会事,蒋云石曾来电,并布置积极。

《天津解慎安四密电》(1931年12月17日),阎档,12/1461。

《上海煜如芷青功密电》(1931年12月17日),阎档,21/0626—0630。

又对此举并曾向汪言,定暂经合作,汪不可利用阎、冯对副司令有何作用,此为条件之一。至于当地有何反动,不妨以实力压迫。

有了蒋介石的明确支持,张学良的胆子顿时壮起来了。12月26日,他在北平宣布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共发表委员卅一人,华北各主席、各军长等俱有名。此外方本仁、李石曾、张继、熊希龄等均在内,并闻明日即成立北平军事整理会,委员人选大致张(学良)、于(学忠)等人。其作法无形中不啻与京成对峙。闻此皆李石曾等之主张也。”所谓“李石曾等之主张”,其实就是蒋介石的主张。

而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21日在南京举行。此时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各派人物纷纷入京,但反蒋派的“大老”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都以种种借口滞留京外,观察事态的演变。蒋下野通电发表的当天,孙科、邹鲁就急电阎、冯,请立即赴京与会。而阎锡山部属商议后电阎建议:“应复电孙、邹,表示南下出席。徐(永昌)谓以‘约同入京’措词最为相宜。赵(戴文)谓银行界、党部、军人、英美均不愿蒋下野。最近恐有所表示。振(曹世振)以为蒋如不下野,军人表示定在各中委入京、一中全会开会后,再拥蒋继任主席。彼时在蒋势力范围之下,多数中委难免为彼左右。”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胡、汪、阎、冯四人全都不肯主动入京,而同时又不断彼此致电,催促对方入京。先是18日,胡汉民由香港致电冯玉祥、阎锡山表示:

《南京王树翰致北平张学良养丑电》(1931年12月22日),阎档,49/0915。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电》(1931年12月26日),阎档,80/2045。

《太原曹世振静密删电》(1931年12月15日),阎档,12/1452-3。

闻精卫兄病滞沪滨,弟亦因血压过高必须疗养,势难赴京。而此次全会使命至重且大,所赖于两公主持者亦多,亟盼刻日命驾晋京,共商大计。

随后,汪精卫自上海致电阎锡山表示:

公偕焕章、次陇、允臣三公同入京,党国之福,万不可因弟之病而致中止。弟如能自支,决无不入京之理也。

而冯、阎等人一面联名复电胡、汪表示:“国难当前,入京开会,义不容辞。大驾何日起行,尚祈早日见告,以便追随前往。”同时,再电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等粤方代表:“弟等聚商,电请精卫、展堂两同志力疾入京。得复,弟等亦即同行。更望兄等一致敦促。”实际上大家都在相互推诿,并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甚至连已由广州到上海的李宗仁也借口“渠在粤,对叔均(指蒋)下野是否诚意不甚明了,拟看三两日,再同精卫入京。”各派领袖之间表面上都把话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相互猜忌、拆台,毫无精诚团结可言。

此后,阎锡山向四届一中全会提出《速检拨十万劲旅增防锦州案》,表露出他在军事上已跃跃欲试,准备扩展自己的行动范围。当全会讨论这一提案时,覃振首先表示:“一方面责成张学良,一方面密令阎锡山、冯玉祥协同商量办法,固守锦州。”覃振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支持借此恢复阎、冯军权,打击张学良的势力。此举

《上海号转胡展堂先生四密巧电》(1931年12月18日),阎档,12/1472—3。

《上海汪先生四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阎档,12/1486—7。

《致上海转胡展堂汪精卫四密漾电》(1931年12月23日),阎档,12/1478。

《太原冯焕章静密敬电》(1931年12月24日),阎档,12/1481。

《上海煜如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阎档,21/0660。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5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立即引起宁粤双方的激烈争吵。首先出来反对阎锡山提案的就是商震,据赵丕廉会后向阎锡山报告称:

今日会中议钧座第一案,会中形势极为紧张。启予(商震)首先反对,谓军队是有系统的,军事须有准备。北方军队完全归子志(张学良)节制指挥,岂一空头中委相能统率等语。朱培德等和之。锦帆、理鸣、沐波、子良、协和、颂云诸人均系赞成者。

赵丕廉进一步分析道:“会中显分两派,而号称左派者则不发一言,显露联蒋状态,而尤以启予说话最为失态。”汪派在得到蒋方承诺后,马上放弃了联阎排张的方针。对此,赵无奈地表示:

汪蒋结合,蒋拉张,汪拉孙(科),看来对北方政局精神上无转变希望。顷晤顾(孟余)、陈(公博),明(赵丕廉)询其对惩张办法有无准备,未能明确达复。明言蒋只合汪,而仍利用张,以制与汪接近之阎、冯,不使其地位开展,谁可作汪之后援者?且北方将领全体恶张,而蒋仍以北平政分会保全张及李石曾等势力,果如此,则阎、冯依然在被迫中,岂不令北方将领对汪失意耶。顾乃竟出北方将领亦多愿与张合作之说。由此可见汪派对我们利害,已在所不顾矣。盖汪派为沪选十委希望南京协助成功,孙则愿任行政长。孙、汪皆有弱点,故对我方事务未肯力争。

赵丕廉等为此向阎锡山建议道:“为我方计自以设太原会为宜。”但汪派投蒋后,完全秉承蒋的意志,“公博主张拟在北方政委会内将钧座(指阎锡山)加入,精卫亦原有此主张。公博则主在过渡期内用一文人如李石曾等主席,将张地位降低,然后再图第二步

《上海煜如芷青天密有电》(1931年12月25日),阎档,21/0717。

《上海芷青天密码电》(1931年12月22日),阎档,21/0699—0704。

办法,不主太原设会。”

四届一中全会最大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央政制改革案》,改变了蒋介石在半年前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他的一切特权。改革案主旨是以责任内阁取代国府主席的特权,并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新一届行政院长。1932年元旦,新内阁宣誓就职。孙科上台后,既求不得蒋介石、汪精卫的合作,又寻不到胡汉民的支持,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在参与逼蒋下野后不久,便不得不向蒋氏屈服。

阎锡山看到局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只好将注意力转向在西北尚有一定实力的马家军,以图自固。1月7日,马福祥曾有一电致其子马鸿逵称:

昨晤贾煜如(景德),父极表联络好感,赞成百公(阎锡山)实业救国主张。西北事如百公意主持,惟有联蒋远冯之一法。贾甚以为然,云:百公对父意亦甚同情。伊将此请转陈百公。

1月初,因锦州失守,再次引起各方对张学良的不满。潘宜之致电阎锡山报告:“此间向中央建议如下:一,拟免张职,以明其丧师失地责任,如有困难或另调一闲职,去其实权;二,太原设政治分会,以公任主席,并予以军事名义,巩固国防,察、绥、晋三省属之。”

同时,蒋介石也得到数则情报:一“谓胡汉民负气终不肯合作而胡派诸人则拉冯玉祥甚力”,一“谓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主张

---

《上海煜如芷青天密勘电》(1931年12月28日),阎档,21/0738。

有关孙科内阁的情况可参阅拙著《从蒋氏下野到蒋汪合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南京马福祥致许昌马鸿逵电》(1932年1月7日),阎档,61/0150。

《广州潘宜之先生二密铣电》(1932年1月16日),阎档,12/1517。

在京设军事委员会支配军事。又谓张学良拟欲辞职。蒋深感此时去张对自己十分不利,思之曰:“学良可念。”于是,急电宋子文:“此时以巩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鲁、晋政治分会如有必要,中亦无成见。如此汉卿兄能不辞职,务请勿辞。请以此转汉卿、石曾。”

张学良得到蒋的进一步支持后,立即“在平与到平各将领极力亲密,惟暗中遴员分头与各方联络,仍妒阎、冯出山。”

1月10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报告各方态度,曰:

昨焕章来谈,表示当此国难,万事应勾消,一致对外。又哲生来访谓:此次出任原系过渡性质,在诸元老指导之下,以济国难。现胡之不来已定,汪则表示以兄之行止为进退。倘兄仍不出,渠惟有辞职。并请弟同来奉化,仅允先电请示。

看到孙科终于肯低头,恳请蒋介石复出,并明确了汪、胡以及冯玉祥等人的态度后,蒋介石即约汪精卫在杭州会谈,决定同赴南京,从此正式确立了蒋汪合作的新局面。28日,国民党中央会决定汪精卫接替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就在汪精卫上台的当天,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武力进攻上海。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坚决奋起抗击。

1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决定于国民政府下设军

---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8日,《事略稿本》,蒋档。

《蒋中正电宋子文旨在巩固张学良地位请其勿辞》(1932年1月8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7

《太原孙司令楚昌密真电》(1932年1月11日),阎档,12/1510。

《孔祥熙呈蒋公一月蒸电》(1932年1月10日),蒋档·革命文献·蒋主席下野与再起卷。

事委员会,推蒋介石、阎锡山等 11 人为委员。3 月 1 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等 7 人为委员。蒋介石再次重掌军事大权。而阎锡山也于此前一日宣布誓就任山西绥靖公署主任。

自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的势力可谓元气大伤。他被迫首度离开自民国建立以来亲手创建的晋系地盘。但仅仅一年之后,他利用宁粤对峙的机会,成功地夺回了对山西的控制权。尽管吵吵嚷嚷,声势浩大的南北联合反蒋活动喧嚣一时,但终因各派系之间推三阻四而未果。此后蒋汪结合大势已成,汪精卫自然不愿继续支持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蒋介石虽一度下野,但再起已成定局。在北方,蒋更愿意选择同一向支持他的张学良合作,而决不愿看到反复无常的晋阎、鲁韩势力的进一步扩展。因此,当张学良的脚跟暂时站稳后,阎锡山、韩复榘就不可能再有所行动。此后,在共赴国难声中,阎锡山获委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山西绥靖公署主任之职,得以重掌晋系军权。他的反蒋倒张活动告一段落。尽管此后阎锡山很难形成同蒋介石相抗衡的实力,但在国民党权力重组后的联合政权中,他得以继续利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始终牢牢控制着自己在山西的势力范围。

〔作者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谢维】

---

1932 年 1 月 30、31 日(南京)《中央日报》,均为第 1 张第 4 版。  
(南京)《中央党务月刊》第 42—44 期合刊,1932 年 3 月,第 14 页。



## Yan Xishan 's Activities Opposing Chiang Kai-shek and Zhang Xueliang before and after the Nanjing- Guangdong Conflict

..... Jin Yilin (50)

Yan Xishan ruled Shanxi Province for almost 40 years from 1911 to 1949. This is a unique phenomenon among local power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War of 1930, he was forced to relinquish power. It seemed that he would disappear from the scene for a time and would not be able to rise again. However, after less than one year, he publicly returned to Shanxi and recovered his former powers and forces, and once again began maneuvering on China 's political stage.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Nanjing and Guangdong, Yan Xishan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campaign to force Chiang Kai-shek to relinquish power. At the same time, he directed an attack at Zhang Xueliang who was domestically and diplomatically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of the September Eighteenth Incident. Yan secretly allied with Han Faju in the North and Wang Jingwei in Guangdong to oppose Zhang. Though these activities of Yan Xishan did not succeed, he took advantage of this chance to recover his forces. For a long time, most academic work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Yan 's activ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Nanjing- Guangdong conflict. The author uses Yan Xishan documents preserved in Taiwan and tries to illuminate this historical riddle. Taking the case of Yan Xishan 's restoration to power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further explains the inner factors of mutual compromise and power redistribution between different factions of the Guomindang during the Nanjing- Guangdong conflict.

## The Reform of Waste Disposal Management in Beijing City in the 1930 's

..... Du Lihong (90)

During the 1930 's, the management of waste disposal in Beijing was chaotic and plagued with problems. Night soil collectors were known as "night soil despots", their extortionary and domineering actions brought much inconvenience to the daily lives of citizens,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bad. Aside from this, the poor quality of night soil collection equipment resulted in filth being spread all about and a pervasive stench, which seriously affected the city 's image.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sanitation authorities first took a number of measures to reorganize waste management, but they were ineffective. Searching for a thorough solution, the municipal authorities proposed that the city take over waste disposal. But because this would have an effect on the night soil collection industry 's profits and on the livelihoods of a large number of night soil collectors, the plan encountered resistance from both the night soil merchants and the night soil collectors, and could not be put into effect. Afterwards, the city changed its policy and implemented a cooperative public-private system [an officially supervised private industry]. After two years and nine months of effort, the reform be-